

人物小传：胡正先，1918年9月出生于安徽六安，1930年12月参加红军，亲历长征，1938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曾任军委某部中南局办公室主任、总参某部部长、参谋长、副部长、顾问，参加了辽沈战役、平津战役、解放海南岛等著名战役战斗，先后被授予三级八一勋章、三级独立自由勋章、二级解放勋章和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。

听“风”的哨兵

——老红军胡正先之女胡廷华回忆父亲

胡廷华口述 汤伟整理

在红军队伍里，有这样一群人，用耳朵听“天外之音”，以忠诚辨“秋毫之末”，被毛主席亲切地称为“长征路上的‘灯笼’”。

从不识字的小战士，成长为红军队伍中的一名通信工作者，我的父亲胡正先，就是这样一位红色“听风者”。

2026年1月19日凌晨，108岁的父亲在家乡安徽六安安详离世。在这之后的日子里，我的耳边仿佛总回响着滴滴答答的声音。那是父亲一生最熟悉的声音，也是他留给我最深的记忆。

（一）

父亲生命中最后的几年时光，从北京回到六安独山镇的老家安度晚年。家门口那条蜿蜒的林荫小路，他几乎每天都要走一走。

记得有一次我陪父亲散步时，他忽然停下脚步，摸着一口改不掉的六安方言，吟诵起贺知章的诗：“少小离家老大回，乡音无改鬓毛衰。儿童相见不相识，笑问客从何处来。”随后，他拄着拐杖站在那里，望向路的尽头说：“当年，我就是从这条路走出去的。”

那时父亲已年过百岁，但他仍清晰记得10岁那年，爷爷沿着这条小路送他去邻村给一户人家放牛时，满脸愁容地对他说：“咱家三代篾匠，混不上一口饱饭，你要另寻一条活路啊！”

1930年，父亲12岁。在独山苏维埃保卫局特务连的院子里，还没有一杆步枪高的父亲找到连长，提出参加红军的请求。连长欣然应允，可父亲仍怕连长反悔，又同他拉了钩。“红军就是我的家，我就跟着红军走。”那时父亲年纪虽小，但红军对老百姓的爱护、老百姓对红军的向往使他确信：跟着红军走，就能寻到“活路”。

然而，父亲接下来的从军路，走得并不顺利。有好几次，他“差点掉队，又坚持跟上了队伍”。

其中一次发生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反“围剿”中。为加快行军速度，部队转移时组织人员就地疏散，年纪较小的父亲被安排回家。父亲不吭声，闷着头跟在队伍后面，部队走多远，他就走多远，最终重新回到了队伍中。

后来，父亲在红军医院当护理员。在部队马上要翻越巴山进四川的时候，他的双脚被开水烫伤。考虑路途遥远，部队决定暂时将他留在老家乡。那天天空下着雪，想到参军以来的经历，想到患难与共的战友，父亲心里愈发难过。第二天一早，他就拄着棍子，一瘸一拐追赶队伍。脚上的纱布被雪水浸湿，伤口钻心地疼。可父亲顾不上这些，他坚持着往前走，辗转多日，终于在山坳里听到熟悉的军号声。

“认准了的路，再苦再难也要坚持走下去。”晚年回忆这段经历时，父亲这样说。

（二）

这是令父亲终生难忘的一幕。

1932年的一天清晨，部队正在一座小镇休息，敌人突然来袭。紧要关头，父亲看到两个同志拉着一个同志跑，被拉的同志先是从口袋里掏出银元往外丢，随后又掏出一个本子，一边撕一边往嘴里塞。

父亲当时觉得很奇怪，后来别人告诉他，那名同志叫蔡威，是电台上的老同志。他丢掉银元是为了吸引敌人去捡，他一口一口吞下去的是电台密码本，为了防止落到敌人手中。

作为我军技侦工作的先驱，蔡威的形象从此深深印在父亲的脑海里。只是那时的父亲没想到，从小没读过一天书的他，有一天会和电台结缘。

当时，红军对电台工作十分重视，战斗在情报战线的“听风者”普遍具有较高的文化基础，父亲显然不满足这一条件。他能够被选进这支队伍，主要是因为上级看中了他刻苦学习的劲头。在艰难困苦的行军路上，父亲盯着前面战友背后的识字板，一个字一个字地背记。上级来选人时，他拿起笔，吭哧吭哧写了大概三四百字，才得以进入无线电培训班学习。不过，因为文化底子薄，父亲在培训班比别人多学了一期。

身为通信工作者，父亲和战友们虽然不冲锋在最前线，却充当着部队的“眼睛”和“耳朵”。他们手中的一字一码，关乎着指挥决策，连着千军万马。

父亲曾回忆，当年其他战友背着枪行军，而他随身携带的，是几节用竹筒装着的干电池。干电池没电了，他们就自己想办法，把干电池的锌皮剥下来泡在盐水中，利用化学反应让干电池恢复部分电能。

这些干电池有多重要？父亲讲过一个故事。有一次，部队夜晚行军时突遭敌人袭击，父亲不慎掉进三四米深的沟中，干电池不见了踪影。父亲心急如焚，赶忙摸索寻找，摸到了摔下去的牲口、粮食甚至金条，但这些他都不要。父亲说，没有干电池，电台发挥不了作用，部队就成了“盲人走夜路”——“干电池是我的武器，是我的生命，我一定得摸到它”。

就这样，在那条看不见的战线上，父亲和战友们日夜守护着电台，用心破译截获的情报，如同听

“风”的哨兵。父亲说过，那时候，他们把敌人的波长、发报时间、发报手法等都掌握得清清楚楚。哪怕敌人换了波长，他光听发报的“手迹”，就能知道对面是哪个报务员。

解放天津前夕，父亲值班时截获的一条情报，让他瞬间绷紧了神经——“共军司令部驻在杨柳青，房顶上放了一块镜子，明天一早去轰炸。”上报，转移，当夜完成。第二天，敌机果然来了，杨柳青一片火海，而我们前指机关无一伤亡。

讲述这些往事时，父亲语气里带着一丁点小小的得意。从风雨如磐的长征路，到摧枯拉朽的解放战场，父亲的责任、使命与荣耀，都在那一声声哨喀中。

（三）

阳光洒满小院，父亲坐在椅子上，娓娓讲述着长征故事。一群“红领巾”簇拥着他，聚精会神地聆听。

这是父亲晚年生活中常见的一幕。这些年来，他一直关心着下一代的教育，特别热心于红色基因的赓续传承。

10年前，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，父亲应邀走上央视《开学第一课》的讲台，给全国的孩子讲行军途中如何赤脚走过遍布“三棱刺”的路，讲自己一生的榜样蔡威，讲长征路上怎样靠土办法维持电台运转。我在台下看着父亲，98岁的他全程站立宣讲，眼睛里全是光。

6年前，一位上海的历史老师到家中拜访，父亲与她交谈许久。他告诉那位老师长征时期的红军军旗是什么式样，告诉她用粳米稻草和糯米稻草编织出的草鞋穿在脚上行军的区别，希望她能讲给她的学生听。

2年前的5月31日，六安市裕安区石板冲乡第二小学的孩子们来看望父亲，以此来庆祝“六一”。孩子们载歌载舞向父亲表达敬意，父亲高兴地把他们拉到身边，与他们合影，给他们讲“听风”的故事，鼓励孩子们好好学习，长大后报效祖国，建设家乡。

如今回想父亲坐在院子里读书看报、为宣讲精心准备的身影，回想他讲战斗故事时抑扬顿挫的声调，回想他摩挲老电台照片时专注的眼神，我心里总会泛起一股暖流。

我知道，父亲之所以在期颐之年仍不遗余力讲述长征故事，背后饱含着他对党、国家和人民赤诚的爱。我一直记得，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群众游行时，父亲作为唯一一名身着红军服装的老兵，在礼宾车上朝天安门庄严敬礼，眼含热泪。父亲说，看到党领导人民把国家建设得这么好，他和战友们当年的苦没白吃，血没白流。

父亲生命中的最后一段日子，大多是在昏睡中度过的。2025年12月25日下午，有人到医院看望他时，他忽然睁开眼睛。父亲已很久没那样清醒过。令大家都没想到的是，当病房里一台仪器反复发出滴滴的声音时，他的手指竟随着声音一下下地敲动。

那一刻我意识到，在生命的尽头，父亲念念不忘的仍是那段听“风”岁月。不然，当时身体已十分衰弱的父亲听到滴滴声，不会是那样的反应。

如今父亲走了。但他生前写给前来看望他的新时代官兵们的一句话，永远留了下来——“听党话、跟党走，为国为民奋斗一生”。

9月11日，六安市舒城县人武部组织2026年下半年预定新兵开展“跨越时空对话，坚定从军信念”教育活动。通过AI技术，预定新兵与屏幕上虚拟的父亲对话。大家齐声告诉父亲：“请老前辈放心，我们一定赓续红色血脉，苦练杀敌本领……”

我知道，那正是父亲所期望的。



红二十五军在河南罗山何家冲一带进行长征前最后一次整编，图为何家冲红二十五军军部旧址。

在调整中前行 ——红二十五军长征三次关键整编纪事

余微 陈仁喜

纵观红二十五军的发展历程，数次整编贯穿始终。每一次整编，既是对前一阶段战场态势的及时回应，也是对下一阶段战略走向的主动塑造。其中，何家冲、蔡家川和江口镇的三次关键整编，对这支孤军长征的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。从鄂豫皖到鄂豫陕，再从陕南到陕北，红二十五军以不足三千人的规模率先抵达陕北，且兵力不减反增，书写了长征史上的独特篇章。

何家冲整编：压缩层级，以“瘦身”换“机动”

1934年秋，鄂豫皖苏区在国民党军数十个团的反复“清剿”下日渐萎缩，敌我力量悬殊，根据地已难以坚持。11月11日，中共鄂豫皖省委在光山县花山寨召开常委会议，果断作出实行战略转移的决定。两天后，红二十五军移驻罗山县何家冲一带，按照花山寨会议精神，开展长征出发前最后一次整编。

何家冲整编核心举措是撤销师一级建制，军直辖第二二三团、第二二四团、第二二五团及手枪团，全军共2980余人，对外打出“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”旗帜。这一指挥体系调整，将原本“军一师一团”三级指挥体系压缩为“军一团”两级，大幅缩短了决策与执行链条，提升了部队机动能力。同时，全军开展“打远游击”“创建新苏区”政治动员，安置伤病员，精简非必要繁重，完成长征出发前各项准备。

在红二十五军即将告别根据地、赴陌生敌后开展连续作战的背景下，何家冲整编赋予部队宝贵的生存条件——速度与灵活，解决了部队“怎样活下来”的现实问题。11月16日夜，部队冒雨出征；此后二十余天，以日均近五十公里的速度跨越平汉铁路，连续突破敌人封锁线。虽遭遇独树镇、庾家河等恶战，部队仍能够迅速摆脱险境。

蔡家川整编：减少单元，以“收缩”求“扎根”

长征开始后，红二十五军连续转战，12月10日的庾家河战斗部队伤亡惨重。战斗结束次日，中共鄂豫皖省委率部转移至庾家河以西十五公里的蔡家川实施整编。

蔡家川整编核心举措是撤销第二二四团建制，将该团干部、战士分别补入第二二三团、第二二五团，全军缩编为两个步兵团和一个手枪团，共2500余人。

这次整编表面看是因战斗减员被迫“收缩”，更深层的考量在于：此前庾家河会议已经作出在鄂豫陕边界创建新根据地的决策。创建根据地，要求红军不能再依靠大范围游动规避敌人，而要在有限区域内开展机动歼敌和群众工作。缩编为两个主力团之后，指挥更加集中，火力更为凝聚，为“大回旋”作战创造条件。规模精干的战斗编组，既能灵活穿插于敌军空隙，又可在关键方向形成局部优势。整编后仅十几天，红二十五军开展“南下郧西，北返洛南，东入卢氏，西转蓝田”的大回旋作战，清剿地方民团、发动群众，至1935年初成功开辟鄂豫陕革命根据地，部队兵力迅速恢复至近3000人。

蔡家川整编以战斗单元的“收缩”换来了根据地创建的“扎根”，实现了从“过境部队”向“扎根部队”的角色转变，解决了“怎样立得住”的现实问题，为红二十五军赢得长征途中第一个宝贵的休整与发展窗口。

江口镇整编：充实力量，以“扩容”谋“北上”

1935年7月，鄂豫陕根据地日趋巩固，红二十五军发展至3700余人。此时，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正在川西北艰苦北上。7月15日，中共鄂豫陕省委在洋峪口召开紧急会议，作出率主力西征北上、配合主力红军行动的决定。7月27日，红二十五军抵达陕西留坝县江口镇，开展整编。

江口镇整编核心举措，是将第四路游击师280名指战员以及江口地区参军的青年，分别补入各团。整编完成后，军直辖第二二三团、第二二五团及手枪团，连同机关、直属分队，全军4000余人。与此同时，部队就地补充物资、医治伤病员，开展西征北上思想动员，筹粮十余万斤。

这次整编的战场逻辑与前两次截然不同：何家冲重在“瘦身”，蔡家川重在“收缩”，江口镇重在“扩容”。在即将告别经营数月的鄂豫陕根据地、向西北纵深挺进之际，红二十五军最大限度充实兵力与物资储备，以应对陌生区域接踵而至的各类战斗。此后，红二十五军西进甘肃、北上陕北，在没有根据地依托的陌生地域连续作战两个多月，始终得益于因粮供给不足陷入被动局面，这充分得益于江口镇扎实的战前准备。尤为可贵的是，整编之后全军士气高昂，指战员们清楚此行使命是“迎接党中央”“迎接主力红军”，自觉把政治觉悟转化为顽强的战斗意志。8月，在泾川四坡村战斗中，军政委吴焕先壮烈牺牲。部队依托整编形成的坚强建制奋勇突围，于9月15日率先抵达陕北延川县永坪镇，完成历时十个月、转战近万里的长征。

江口镇整编以力量的“扩容”筑牢了北上征途的底气，让红二十五军在脱离最后一块根据地之后，依旧保有充足的战略续航能力。

三次整编，三次因时势的战略调整，贯穿红二十五军长征全过程。它们并非简单的编制调整，而是这支部队于绝境中求生存、于转战中求扎根、于远征中勇担当的生动写照。红二十五军以不足三千人的力量孤军北上，途中没有后方依托，也没有兄弟部队策应，却能够率先抵达陕北，实现兵力不降反增。这依靠的正是实事求是、灵活机动的整编智慧，以及全军指战员对党忠诚、对革命前途抱有的坚定信念。

（配图均为资料图片）



红土地



投稿邮箱：48221941@qq.com